

“固守”抑或“逃离”： 当下大学生预期就业一线城市偏好探究

文/陆杰华 岑欣仪

研究背景

早在十年前，白领间兴起一种“逃离北上广深”的思潮，即逃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而移居到其他二、三线城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生活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较其他城市有较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逃离北上广深的现象并没有消退的迹象，反而还有所加剧。

在逃离一线大城市的潮流下，大学生群体的预期择业地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大学生就业区域的改变主要源于外部因素（环境）和内部因素（心理）的改变。在外部因素方面，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可获得性的差别、心理成本、房价和短期的货币收入等都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区域的影响因素。而在心理因素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生在择业观上变得更加灵活，21世纪初高校毕业生往往把工作岗位能否施展个人才华、体现人生价值视为最重要的择业因素，勇于尝试互联网催生的各种职业。

不过，在宏观环境和微观因素一同改变的情况下，大学生的预期就业地点产生了何种变化仍未明朗。在权威数据的缺失下，全社会难免对大学生的预期就业走势缺乏了解，同时影响或推迟了政府相关政策的形成。为此，本文尝试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当代大学生调查数据，重点揭示近年大学生预期就业城市偏好的趋势，并探讨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进行就业。

相关文献回顾及其研究假设

总体来讲，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公开数据主要以市场调查为主，并重点针对毕业生的就业流向进行调研，可能源于这些调查采用了相异的抽样框和调查方法，其研究结论往往有所差异，较为一致的是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增加。不过，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在校生的就业城市

意愿或偏好，由于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容易受到不同城市就业难度的影响，从而其不仅反映了是否存在远离北上广深的就业选择趋势，还反映了一线城市在就业上的挤出效应，因此，不同于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在校生的就业偏好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大学生在就业上是否仍然愿意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主动”地远离一线城市。

关于择业地点的影响因素方面，由于调查群体和方法的不同，相同的影响因素的显著作用在不同研究中可能存在或消失。有学者指出院校类型、就读地、年龄和性别对工作地点的选择没有影响，但生源地所属地区类型、自我认知的社会阶层和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度则影响显著。然而，亦有研究发现就读地点、生源地、性别、出生队列、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在是否于一线城市就业中起着显著作用。有不少研究均集中探讨以上影响因素背后的逻辑链条，有研究指出城乡背景对大学生的就业地点流向起的是间接作用，因为城镇大学生相比农村大学生更可能就读层次较高的院校，从而更容易在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成功找到工作。也有研究对生源地对择业地点的影响群体进行了区分，发现一般来说毕业生偏向于留在生源地就业，但重点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更倾向于留在院校所在地就业。有研究则指出，大学教育使大学生进入更高级别的地区进行就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院校所在地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的院校，二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教育。而想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一方面包含着希望提高其能力和锻炼其技能的祈愿，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想要前往更高平台进行发展的愿望，故可假设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更希望前往一线城市进行就业。

此外，由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未有足够先赋性资本作为启动资金在一线城市立足，再加上后致性社会资本较低的大学生或较难在一线城市获得理想就业岗位，因此受教育层次更高（后致性社会资本）、生源地为城市、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更高（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大学生会更偏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此外，就读地区往往是未进入社会的年轻人除家乡外最为熟悉的城市，再加上一线城市就业机会多、生活丰富，因此在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难免对其院校所在地产生黏性。

另外，有研究显示大部分独生子女大学生选择省内就业而非北上广深等一线省市，其中过半数更少青睐省内城市，另一方面，兄弟姐妹数量较多的大学生承担着更大的养家责任，因而或会更多地前往一线城市进行就业。故此，本文假设作为独生子女会对在一线城市择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兄弟姐妹数量则会对选择一线城市作为工作地点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加入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探讨核心自变量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的影响。

数据、变量测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开展，其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调查各获得包括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在内的7 230个、11 039个和13 981个有效样本，剔除缺失值后，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分别最终保留样本6 176人、8 977人和13 011人。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选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毕业后的就业地点”，选取2013年调查问卷中的“毕业后您最想去工作的城市是”和2015年、2017年调查问卷的“毕业后您最想去的工作地是”该项问题，并对其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一选项进行0、1编码。

自变量方面，在生源地上，本研究将通过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来进行划分，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种；受教育层次则进行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三类的划分；院校所在地区简单划分为一线城市和非一线城市。由于个体的教育程度往往决定了其社会地位，而父亲往往是一家之主，因此家庭的社会地位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为代表，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职高、高职/专科和本科及以上五种。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为代表，

选取问题“与周围同学相比，您的家庭经济条件是”，本文将其选项再次划分为“较差、一般和较好”三类，并以较差为参照组来进行回归。由此，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两个变量，分别是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与周围同学相比的家庭经济条件。总结而言，本研究控制变量为性别和年龄，核心自变量则是包括户口状况、受教育层次（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院校所在地、兄弟姐妹数、是否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是否想攻读更高学位。

（三）分析方法

为观察在校大学生是否在就业偏好上存在远离北上广深的现象，本研究首先将2013年、2015年和2017年选择北上广深的比例分群体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外，为确定哪些大学生群体倾向于流向一线城市，以及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毕业后是否最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工作”为二分类变量，故对2017年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数据使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的分析方法。

研究发现

总的来说，毕业后期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总体上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择业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22.67%、34.99%和35.32%。其中该比例在2015年增长迅速，相比2013年增加了12.32%，而2015年和2017年的比例相当，仅增加了0.33%。就整体而言，当代大学生在择业意愿上并不存在“远离”北上广深的现象。

在不同年份的比较上，不同群体均显示出更强的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而分群体在不同年份间的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到不同年份的不同群体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即在不同群体的比例的排序在不同年份间较少出现差异。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为追踪调查，因此以下我们将仅使用2017年的数据进行二元逻辑斯特回归，考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群体的大学生之间其一线城市就业偏好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拥有更高的毕业后期望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而年龄、户口状况和受教育层次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毕业后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并

没有显著影响。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对比上，虽然在比例上有更多非农户口的大学生倾向于在一线城市就业，但正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城乡背景是通过影响就读院校的层次继而影响其就业地点，从而或造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在控制了院校地点后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不存在显著作用的局面。为此，我们在模型2中除去院校所在地的变量，可以看到上大学前的户口状况对大学生的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存在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受教育层次对一线城市就业倾向从不存在显著作用变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显示受教育层次也通过就读地点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发挥影响。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的概率是非一线城市就读的大学生的6倍以上。兄弟姐妹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区别于零，但从模型1到模型2，兄弟姐妹数对北上广深就业偏好的正向作用从不显著变为显著，显示了兄弟姐妹数对院校所在地起着间接作用——兄弟姐妹较多的大学生相比兄弟姐妹较少的大学生会更少地在北上广深等地就读，从而影响了其毕业后的择业地点规划。另外，作为独生子女则对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显示出养老压力对子女的未来规划未产生较大影响。

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结果则表明，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想大学毕业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也越高，但仅有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相比才存在显著不为零的差异。此外，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周围同学较好的大学生，显著倾向于在毕业后于一线城市工作。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认知的家庭经济状况来看，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家庭社经地位较差的大学生会显示出对一线城市择业倾向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社经地位一般和家庭社经地位较差的大学生之间在北上广深就业倾向上则没有显著差距。

最后，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相比不计划攻读更高学位的大学生，其毕业后想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偏好要更高。但有趣的是，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在一线城市就业偏好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大学生在就读更高学位后，或更好地了解自身需求和所想，故而在未来就业地区的规划上会更加贴合自身情况。

结论与讨论

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就在校大学生的未来就业城市偏好而言，“逃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现象并不存在。相反，毕业后期望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占比随时间推移反而更多。因此，在房价逐年上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以及二线城市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对一线城市的热情仍未熄灭，资源雄厚的一线城市依然成为大学生想施展其抱负和能力的的首选。

而哪些大学生会偏向将一线城市作为其理想工作地点呢？从前面分析的结果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决定攻读更高学位、男性、就读院校位于一线城市的大学生相比其他大学生会更期望毕业后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但户口状况和年龄则对其一线城市择业倾向没有显著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假设。一方面，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需要一定的资本支撑，因此父亲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相比其他人越好，其越能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放在其首要选项上。另一方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具有大量工作机会和较高薪资，因此越是期望获得较好生活的大学生就越想毕业后在一线城市就业。

此外，大学生在理想就业地点上对其就读地点产生较大黏性，在对模型进行标准化后，就读院校是否位于一线城市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仍远远大于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出院校所在区域对未来就业地点规划上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给了其他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一个启示，也即提升自身高校实力以吸引人才，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增加当地就业的辅导、引导和宣传，以提高高校人才留在当地工作的就业率，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对于在校大学生一线城市就业倾向的上升趋势，决策者一方面可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适当降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鼓励大学生在一线城市进行实习、就业和创业等，促进大学生真正流入并留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使其作出更适合自身需求的生涯规划。另一方面，决策者也应增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宣传工作，促进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不同城市和区域就业的大学生均等获得较为理想的薪资和待遇，均衡不同类型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1ZDA106）的阶段性成果】